

# 校园重访： 反省台湾大学 1980 年代的校园规划

夏 铸 九

**【摘要】**就 1980 年代《台大校园规划》的历史条件、形成脉络、主要内容与执行过程，讨论其结果与一些经验，并反省它的影响、限制与历史意义。1980 年代的台湾大学校园规划是台湾大学校方有意识地运用校园规划以管理校园成长的起点。在此分析其过程，总结其教训，不但对大学校园规划有积极意义，而且在规划理论与实务方面，对历史地面临快速发展的大机构 (institutions)、城市与区域所面对的挑战，也希望有一定程度的启发。  
**【关键词】**大学校园；校园规划；台湾大学

RETHINKING THE TAIWAN UNIVERSITY CAMPUS PLANNING IN 1980S

Chur-Joe Hsi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ult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Taiwan University campus planning since 1980s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condition, social context, main contents and practical process. It also sums up the impact, limitation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planning, aiming at giving a better management to the university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hopefully, it is referential to some extent for the challenge faced by the establishment institu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urban and region.

**KEYWORDS:** university campus; campus planning; Taiwan Univer-

sity

**【中图分类号】** TU984.14

**【文献标识码】** A

## 1 重访历史的台湾大学校园与校园规划

台湾大学 (以下简称为“台大”) 是日本殖民者的九所帝国大学中的第九所——台北帝国大学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以下简称为“台北帝大”)，因此是殖民大学 (colonial university)。它是台湾第一所，也是殖民时期唯一一所现代大学，是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台大设计画始于 1922 年，1925 年以当时的富田町台北高等农林学校的校地为基础，进行校地收购与校舍兴建，就是过去称为“校本部”，1950 年后称为“校总区”的地方，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台大校园。1928 年，台湾总督府公布台大官制，设立台北帝大，成立文政与理农两学部，本部则设在总督府内 (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委员会工作小组，1983: 22; 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小组，2001: 5)。虽然校总区部分的都市计画学校用地征收，因政府财务原因直到 1980 年代末才算逐步完成，但是就今天所见的台大校园校总区的用地而言，在创始时即可说已具备了雏形。

1928 年的台大校园配置图 (即使其中有小部分日后并未实现) 已确立了台大校园空间文化形式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 的主要性格。大门，顺着瑠公圳流向，向外连接西南近郊新店进

入台北市中心的主要道路 (即今日的罗斯福路)，向内则创造一种入口过渡 (entrance transition) 的效果。其一，由进入校园取向东北 45° 角转折，形成过渡空间的效果。其二，大门设计形式相对较谦卑，佐证了校园规划者一致的设计用意，即，入口宜深藏不露，这也是内奥空间隐密的要求，以转折过渡连接组织校园空间的主要东西轴线。而巴洛克式轴线象征性地朝向日出之东，在集中视线的端景处则计划着南方研究中心的合院建筑物。这个地方神圣化了台北帝国大学由殖民者所托付的任务：入侵南洋必须在知识上预作准备，这得植根于现代的科学研究成果之上。至于轴线两侧则为教学研究核心区，北部为文政学部、图书馆，南侧则为农学教室、理农及专门大楼、理化学教室与生物学教室。南北校舍以丁字路布局，以建筑山墙作为端景，主要建筑的正面则错开配置，建筑内部的南向走廊也才符合亚热带的气候要求。理农及专门本部 (今行政大楼) 与文政学部本部 (今文学院) 作为最主要的建筑物，它们的正立面突出表现了入口的纪念性与仪式性效果，在大约椰林大道两倍宽所形成的一个长方形空间里，南北短轴线的张力隔着庭院与水池遥遥相对，这是主要的学院，也是校区的权力中心。校园的地景植栽多为樟树、白千层等。尤其是樟树，既为适合生长的土生树种，又与东京帝大、京都帝大等殖民母国校

园的树种一致，地景栽植的性格十分相似。当时，校园北边留为运动场，而校园南边的农地，除了小土丘庇佑着有名的鼓亭林公馆、灌溉的圳水道与支流、一些安溪人后代的宅地（如芳兰大厝）、农舍、田地之外，多为总督府农业部农场、中央研究所植物分科园与台大共同使用的农地。

1930年代的台北帝大在日本教育制度及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下持续发展。文政学部前加植茄、轴线两侧以椰子树美化原先栽植稀疏而肃杀的权威空间，教学研究核心区与体能、军训的相关设施也都在此时陆续齐备（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小组，2001：5-6）。除了椰子树带来的热带联想，台北帝大与东京帝大的空间特性基本上是一致的。英国建筑师约西亚·康德（Josiah Conder）对东京大学建筑教育制度与校园，以至于对日本现代建筑早期阶段的折衷主义式西方建筑影响，可以在台北帝大的校舍中一一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殖民大学的校园。由那时起，其实台大校园空间的象征形式就已经确立了。十三沟面砖、开口的施工细部、磨石子、洗石子与斩假石仿石作处理、黑瓦、宽窗台、南向走廊、中庭合院、三层楼建筑物体量、正门口露台、山墙端景、丁字路口、栽植...到东向林荫大道，共同建构了一种空间连续性，一种强烈的个性。值得指出的是，在东京必须有所约束的巴洛克轴线，在台北却可以放手让殖民者取得平均宽达70米的椰林大道。这几乎是所有殖民地的宿命，殖民地的都市设计与计划（colonial urbanism）对殖民者而言还不只应是一面反省之镜，它更是一面放大镜，殖民建筑的选择其实隐含着更多的政治意义，值得昔日殖民者的后代，尤其是昔日被殖民者的后代去揭露<sup>①</sup>。巴洛克轴线统摄了仿欧中世纪古典学院中庭式院落（yard, court），表现了殖民国家权威与知识贵族知识权

威的理性<sup>②</sup>。这里是知识贵族与知识理性的生产地，也是殖民国家的重要学术机构。殖民大学是殖民者的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殖民知识阶级文化熏陶的空间氛围。作为教育的地方所创造的空间经验，对实际的使用者（接受者）——日本人言，这是确保文化再生产的基地，是国家制度里阶层化劳动力的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欧洲讲座式大学研究制度与殖民国家军事与政治要求相结合的研究性大学<sup>③</sup>。而它的历史破绽是，台北帝大校园作为一个学习的地方，它表现的权力欲与控制欲，其实远大于刺激知识、启发创新氛围所需的开放性。至于对殖民大学初期的校园中仅仅零星存在的使用者——本岛人言，这里是还不能进入的殖民知识贵族之陌生殿堂<sup>④</sup>。这种种破绽，其实核心在于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中主体的缺席，而这却正是教育事业的灵魂，使学习过程中有机会产生“青出于蓝”的主体积极性的根源（夏铸九，2000：7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赋予台湾的角色改变为工业与南进的基地，1943年的校园规划配置正是这个政治目标的积极展现（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小组，2001：6）。工学院于同年成立<sup>⑤</sup>，计划中要建17栋如军营般的建筑物，整个校园规划往北大幅扩张，不但预期面积超过原先的教学研究核心区一倍以上，而且大门朝北、辟大水池大广场比椰林大道还要宽一倍、十字路格子模式等，彻底改变了校园原来的布局与既有的空间氛围。但是，一如大部分大规模校园规划的共同命运一般，随着台湾光复，这个伟大的计划也就被遗忘了。

1945年台湾光复，台北帝大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改学部为学院，停办南方人文研究所与南方资源研究所。1950年代的校园发展现状图则说明了在台湾的经济尚未快速发展前，资源较匮乏的现实处境，也谈不上有什么校园规划<sup>⑥</sup>。一旦争取到建设

经费就寻觅基地兴建，避免经费流失，遑论考虑整体校园的品质。空间的品质最后只能寄望建筑师多用心，很难主动提出校园整体关系的要求。大致上说，让椰林大道继续延伸得更长与沿着往北的小椰林道当作发展的基本架构，勉强维持一点表面的空间秩序（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委员会工作小组，1983：26；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小组，2001：6-7）。

虽然没有校园规划可言，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校园空间特色应该有两点必须提醒，即，傅钟、傅园与杜鹃花。

首先，光复后台大校长中最有影响力与象征意义的校长是傅斯年；他虽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三任校长，却是台大由殖民地大学转型，由德、日式讲座教授制转向美式大学的第一步。傅氏是战后台大确立制度，提振校风的关键人物。傅斯年除了“广延教授<sup>⑦</sup>、增建校舍<sup>⑧</sup>、充实图书、奖励研究”这类一般性的肯定之外，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政治压力下处理“四六事件<sup>⑨</sup>”，安定校园，建立制度，改变风气才是关键<sup>⑩</sup>。对傅斯年的想象，已经成为台大校园的历史遗产。譬如说，傅钟与傅园，它的空间的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效果<sup>⑪</sup>，已成为对学术自由传统的心象图绘的一部分。傅斯年任职时间虽然极短，但是，他连结了台大与北大的想象关系，在1949年之后带给台大，已至于整个台湾知识界的影响确是深远的<sup>⑫</sup>。近代欧洲布尔乔亚的自由主义将大学视为公共领域中的批判性言论的知识来源，建构了一种虚构性想象。傅斯年的博学与大度为其特长<sup>⑬</sup>，成功地做为学术界的领导，以斯宾诺莎“贡献这所大学给宇宙”的精神办学，成就一种对大学的想象。但是，他对学术自由风格与大学自主性的肯定价值，在反共与威权政治统治时，竟化身为台大的历史的一部分，以学术独立的神圣性，成为台湾社会抵抗政治高压的象征与共同的历史荣耀，也

使台大成为学术风气最自由的高等学府。在校园的真实空间里，傅钟的实质形式本身并不巨大沉重，但是它位在椰林大道中心，是生活空间体验到的另一种真实空间。它的空间，一种表征（再现）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纪念性不在于形体，就像是钟声，是一种无形但却清楚的声音，在象征的空间中回荡。傅园是傅斯年墓亭所在的植物园，安静地处于喧闹的大门左手绿荫里。傅园按希腊卫城上的帕提农神殿的取向动线与空间布局，安放骨灰的墓亭则为四柱式希腊神殿，都已成为大学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了。至于台大校门本身，作为大门的门面意义，它前面的广场一直是台大与社会互动的地方，是台大校园特殊的“中心”，被师生以及台湾社会视为“民主广场”，是民主选举时，候选人发表政见的理想地方，也因此，在1970年末被学校用墙围了起来<sup>②</sup>。

其次，椰林大道上的龙柏与杜鹃花栽植世俗化了森严的殖民大学空间的神圣性<sup>③</sup>。尤其是杜鹃花，台大校园里种植的杜鹃花品种价廉但生命力顽强。春日盛开的杜鹃花不但软化了殖民大学原来采用的巴洛克轴线表现的权力意志与学院中封闭的层级性空间，它的季节性与烂漫色彩所增加的世俗氛围，更添加了大学校园本来就一直伴随着的浪漫想象。台大校园，长期以来竟被台湾社会视为“杜鹃花城”。台大校园在拥挤而欠缺开放空间的台北市中心，早就被市民们当作是一种补偿性的另类公园，一种有书卷气的公共空间了。到今天，台大校园展现着一种自己也不见得能察觉的都市开放空间的开放性（openness），曾让到访的日本学者惊奇<sup>④</sup>。历史的变化总是充满惊奇，其现实过程则常是复杂的。台大校园的核心区旧校园与宽广的椰林大道已经成为校园象征。与高密度、混乱的台北市都市形式对比，经由市民的眼光与身体的活动，殖民大学旧校园的

纪念性与椰林大道的神圣性的空间符号已经被接受、转换与颠覆了，以及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台大师生辨认校园，自我认同的主要象征元素了。

台大校园真正的问题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后造成台大校园空间上历史连续性的危机。日益增多的新建筑草草建起，一无章法。与社会上对台湾大学的浪漫想象对比，现实却是突兀的粗糙与混乱，1980年初终于让师生都警觉到了校园的问题，它催生了校园规划。

## 2 1980年代初台大校园规划所面对的问题

1980年代初的台大校园成长快速又杂乱，却难有改革的施力点，当时的台大校园规划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开始急速改变的台大校园。新建筑物基地的取得变成不同学院院长间的校园势力范围划分与空间领域角力，与校园整体成长无关。建筑师遴选过程基本上是行政上层的黑箱作业。在不合理且低廉的设计费用限制下，经选择后的建筑师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意愿了解校园，甚至也无力满足建筑物本身日常使用者的实际需要。于是，突兀的、未考虑周围校园环境的单栋楼馆迅速冒了出来。个别的楼馆表现的是校园体制中之单一系所本身的需求，各单位好不容易争取到制度中的经费，都认为是难得机会，于是，空间自然是越大越好，当然更顾不得对周围环境的冲击，结果，原来校园的历史连续性面临急速的改变。校园，其实一如当时台湾其它的人造环境，快速成长所埋葬之校园特色不过是结局罢了，这其实是台湾在经济发展中某些新的、带有历史性与鲁莽性的破坏力量的叙事方式之空间文本。它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学院版本之表征（再现）的空间与象征形式，岂真有象牙塔中的校园建筑？总之，台湾大学的校园是台湾现实社会的一部分，空间是社会的表现。在众人选竞选逐的政

治压力下，1982年已经退休的工学院院长虞兆中教授出任校长。在长期政治监控笼罩下的台大校园<sup>⑤</sup>，竟然由一位没有太多政治背景的教授初任校长，校园好象有了一点生机。在校长支持下开始了台大校园规划。

## 3 台大校园规划的一些规划元素

### 3.1 校园规划方法上的反省

1980年代初推动的台大校园规划受到美国学院里规划与设计专业论述反省思潮与范型转移（paradigm shift）的影响，放弃了行不通的传统蓝图式总体计画（master plan）的形式主义作法。规划者被麻省理工学院凯文·林奇（Kevin Lynch）对长程规划（long range planning）的主张，以及柏克莱加州大学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所做的俄勒冈大学校园规划的观念 [即《俄勒冈实验》（The Oregon Experiment），1975] 所吸引，提出了校园发展的构想后，便拟定校园环境经理的架构，校方成立的校园规划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所形成的决策过程，加上建构一套校园的设计准则（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指导设计操作，试图控制日后之校园成长。

凯文·林奇——检讨显示管理权力的行政单位型、依功能上的理性要求划分的实质空间类型、空间聚集的都市类型、传统学院制的社会共同体类型等等校园，反省美式大学校园规划与现实快速发展间的落差，校园规划成为脱落于现实的、失败的长程规划。战后美式大学校园沦为巨大的停车场，以及，各系所分别争取巨大的预算，快速发展成为各自孤立的楼馆。原来大学知识精英养成的学院既是教学的地方，也是住宿、餐饮、研讨、图书馆等功能混杂的空间。教学、生活与社会活动重叠为一种大的学习团体，而空间单元就等于社会的单元，彼此间正式与非正式地连锁在一起。但是，随着大学

的社会功能转化，这种古典学院已经成为对中古大学的浪漫想象，或是沦为校园规划空间布局时仅具形式意义的空间元素了（Lynch, 1971: 234 - 235, 345 - 347）。也因此，更激进的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即由校园营造预算的分配着手，鼓励零星的小规模成长，以适合校园使用者参与，增加人文的气息，在俄勒冈大学曾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Leu, 1985）。这种态度代表了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欧美社会运动土壤中浮现的反省性人文主义与社区设计取向。当时台湾的主流规划论述是种战斗姿态，当然，也是对实质空间的宣言。

规划者认为，大学校园少有，也不宜有速成式的建设。规划者不能信任现代建筑运动产生的个人英雄主义式建筑师，认为有些建筑师追求将整个校园在其一人手下完成所有的设计，这已不是个人事业之企图心，而根本就是对校园特色塑造的肤浅理解。尤其，由于对未来之不可测，大学校园规划需要的是一个有调适能力的长程成长架构。一个有弹性的成长架构远比图面漂亮的纲要计画切合实际得多。传统蓝图式纲要计画所再现的全盘理性是战后1950 - 1960年代之产物，在快速变动的现实挑战下，早就是不合时宜的专业理性，它表现的成见与权力远比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多。

校园，并不只是大学教育的空间载体，大学校园是大学教育的表征（再现）的空间，简言之，其意义远超过对实质空间层次之简单功能性思考，大学校园是大学的象征表现，大学校园就是大学本身！

### 3.2 拟定台大校园空间形式的成长架构

大学为百年树人之地，大学校园须为百年大计。大学，具备大而稳定的组织，居于一块永久性的基地上，预备长期扩展，也有能力进行长程自我控制与方向领导。像这种地方之规划内容有三个重点：首先，校园之长程规

划需能掌握未来发展的趋势与功能上的调适，它决定了校园活动发生的类型、密度与使用强度。其次，校园规划必须对校园动线系统的层级、序列与流动通过的经验效果等，能预先掌握。最后，最复杂的部分就是开放空间、地景植栽与建筑物的形式特征的把握。为了保持特色又不失应变能力，校园规划长程成长架构，其实是快速成长压力下，校园环境决策过程的经理。它的关键在于“执行”（implementation）而不只是写规划报告而已。尤其在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下，如何让校园环境决策过程民主化，却又具备塑造好校园的能力是不容易的任务。

当时校园规划的主要工作大致沿以下线索展开：（1）推动参与式设计；（2）成立校规会及工作小组；（3）形成主要构想——旧校园历史连续性的保存与特色的强化，这部分可以说是师生们的共识了；（4）形成校园环境的决策过程；（5）由设计准则指导设计操作，完成建筑计划书（architectural program），以此公开竞图，以及，控制校园的成长。

### 4 执行过程与初步结果

台大校园成长的架构确立之后，在最关键的执行过程中，为制度所支持的新的校园规划实际地改变了既定的权力关系。当时最重要的支持来自校长的大力肯定，以及总务处营缮组的行政支持。然而，当时的虞校长不是政治中人，台大的财政困窘并未改善，校园建设很难大幅推动。甚至，当时至辛亥路的校园预定地均未征收，如何在有限的校地中安插已获得营造预算的校舍而不违背校园长程发展的构想，管理成长，成为校园规划工作小组中的机动小组最紧要的专业任务。

很快地，等下一任新校长孙震接任后，校园规划被当作是校园决策权力间的缓冲器，校园规划原来具有的受校长尊重的地位与执行过程所强调的民主参与气

氛就逐渐消失了。这种决策冲突时的权力缓冲器感受，使得校园规划工作小组的技术性工作折冲得十分吃力。最后，校园规划的工作小组行政单位化，有了固定的人员与空间，好处是程序确立了，但是却正式成为校园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它发挥的功能就被不同的总务长的开明程度决定了。

若以实际个案为例，台大校门口设计案的三次挫折，可以说是最真实的校园规划过程的折冲经验了。台大校门口的规划与设计，或者更具体地说，复原1970年末以围墙封闭广场之前的校门，在三任不同校长手上就做过三次不同的方案，甚至历经校务会议讨论，结果都没有机会执行。如今，参加第一次工作的学生与助理，都已在做研究、教书（有的已做完建筑系主任了）、做政务官、成为建筑师、规划师或是顾问工程公司的规划与设计负责人了，而台大校门口的问题却依然如故，没有机会改善。台大校园规划确实值得反省，不然，何以展望未来？

比较起来，倒是一些较小的角落，在校园规划新建立的程序下让一些认真的建筑师与学生的参与式设计取得了一点初步的营建成果。像共同教室、语言中心、环工所、研究生宿舍、小福利社前广场改善等。

由1980年初决定基地位置，于1998年校庆落成，在黄世孟教授负责召集的校规会项目小组与图书馆同仁积极参与下，由森海建筑师事务所负责设计的，新的总图书馆，应该算是光复后的台大校园建筑中唯一一栋可以在营建品质上与殖民时期的旧校舍比较一下品质的。台大总图书馆是1980年代初虞兆中校长主张要争取的唯一一栋校园公共建筑物，其后在孙震校长任内倾全台大之力，成立了图书馆营建工程筹建小组争取预算，在1989年预算正式通过，历经10年以上，到了陈维昭校长手中才大功告成。总图书馆的基地位置当时决

定放在椰林大道终端，一则做为端景，表现总图书馆对于台大的重要象征意义，二则当时在校地未完全征收前实在没有其它选择，而校方原来有旧个计划，竟然是在那儿放个可以集合全校学生听讲的大礼堂。那么，把总图书馆至于最尊崇的位置作为共识，至少可以避免其它方案，把校园品质弄得再恶化下去。这些都算是校园规划构想执行过程所处的真实社会政治脉络。今天，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小组所制作的 2001 年版的《国立台湾大学校园规划报告书》，至少，已经将台大校园规划纳入了一个可公开依循与交换意见的制度性轨道，考虑执行过程中规划与设计的技术人员折冲时所需的艰辛，真是不容易的事。

### 5 何以致此？一点经验

就台大校园本身而言，1980 年初开始推动的台大校园规划执行至今，其中的沧桑值得进一步研究。执行的变化与接任负责校园规划的教授们的理念差异固有，但实际关系不大，其阻力与改变主要因为校园规划的执行关系着既定校园营造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改变。就 1980 年初，校园规划工作推动初期的经验，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留心，作为日后汲取经验之教训。

#### 5.1 使用者参与

即使是 1980 年初的台大校园政治还比较保守的气氛下，当时的校园规划过程就采取了参与式的规划与设计过程。除了在意意见互动上向教职员、学生甚至市民开放外，校园规划本身就是研究生、研究助理以及许多热情、积极、能干的大学部同学参与的成果。尤其是大学部的同学，他们依靠着对真实校园生活的亲身体验，弥补了专业能力不足的缺陷，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在这种倾向下，校园规划工作也试着把各馆舍设计过程开放，强调师生使用者的参与。使用者参与是保证规划与设计决策与成果品质的关键，这是欧美 1960 至 1970 年

代社会运动与专业反省浪潮的产物，空间的改善其实需伴随着社会的改革与人们活力的解放。

#### 5.2 专业者的技术支持

当时，校园规划的建议直接改变了校园环境决策过程，尤其是传统总务处营缮组的工作。校园规划开放了校舍设计的建筑师遴选，以公开竞图为之。公开而公正的竞图除了政治上的意愿之外，其品质需要专业技术的支持。譬如说，竞图的“建筑计划书制作”（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就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它需在竞图之前，先由专业者协助，在使用者参与的过程中先行完成。其次，建筑计划书本身便是校园规划的延伸产品，除了架构相符外，更需在设计准则上相连结。

#### 5.3 制度内积极投入的关键人物

1980 年初推动的台大校园规划之所以能在当时确实改变了部分的校园环境决策过程，让规划报告经由空间论述得以直接干预真实空间的塑造，主要是虞兆中校长的支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土木系茅声焘教授的支持。茅声焘教授是才子型的人物，才华洋溢之外，过人的行政能力更是一般学院学者中少见的。他为了协助虞兆中校长，主动请缨，接任总务处营缮组主任。当时营缮组令人耳目一新，校园工程井然有序，校园规划也得以克服一般规划案所难得把握的真正制度内改革的机会。制度内积极投入的能干人物是改革的枢纽，无此，改革理念终究只是规划语言的书面操作而已。政策是推动者意志的实现，制度也需人才来使其有生气，也因此，人亡政息是同理。

### 6 影响、限制与意义——一点反省

虽然对真实的台大校园的改善有限，台大校园规划倒对台湾的建筑与规划专业界产生了一些影响。首先是对校园规划的规划论述（planning discourse）的影

响，伴随着《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一书对建筑设计理论的冲击，与都市设计及其管制准则（control guidelines）也在 1980 年代初引入台湾，台大校园规划也对保守的专业论述造成了一些冲击。某种程度上在规划与设计专业界内，改变了一点对规划与设计师的想象，营造空间的过程变得层次多了些，手段也复杂了些，这是制度与社会转变的一部分。

此外，看到台大校园的尝试，有些其它大学校园也有一些机会改变过去的“校园营缮工程”所不能应付的局面，试着推动校园规划，致力在校园规划过程中塑造与改变大学的意象，这其实关系着台湾社会美感教育提升的深层课题，也是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历史的与社会的任务。

若由自我反省的角度提出校园规划意义上的思考，1980 年代初台大校园规划所致力的大校园空间的历史连续性保存与特色塑造，或许，只是在当时时空条件下再现了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对大学校园的古典空间想象？其后，使用者民主参与的理想逐渐空洞化，例行的行政权力仍然凌驾了使用者参与的设计过程。1980 年初开始推动的台大校园规划展现的能力还嫌稚嫩，在时机上以及实力上都还不足以提供为大学教育改革的历史计划的物质空间支持，校园规划本身在校长更迭后也得不到足够的制度内改革的支持。

1980 年代台大校园急速成长的根本动力并未因校园规划对空间与形式上经理而获得根本的改变。即使在规划方法上做了检讨，美国式州立大学快速发展的弊病也未能真正避免。孤立的楼馆以系所为单位争相冒出地面。如同校园，学院，在发展的压力下成为形式上的校以下单位。既有的旧式学院（colleges）单位已经无法统筹快速发展的系所在新的教学与研究发展功能上的要求，增强横向的联系（linkage），这甚至是学院以上的大学行政单

位本身也无法阻挡的力量。或许，更彻底的引入美式制度，以更多样的学院 (schools) 与更弹性的学程已经是大势之所趋。它的优劣需回到大学角色在新形势下如何重新定位才能加以评估。譬如说，应更根本地检讨大学部与研究生院的关系。有些专业学院与新兴科技学院快速成长的现实确实说明了大学在新经济亟需的创新能力上所扮演的研究与发展角色，结合企业，提升生产力，它们确实必须受到鼓励，不然就会落后。但是，这样做却不必然要改变大学部本身的通识教育意义，这样，才能适合新社会长远发展的人才培育要求，在人文与社会的层面深耕。大学必须是科技与文化的桥梁，不然，未来的科技与文化之间，如何得以再度有机会平等对话？

假如进一步提出反省，台大校园规划的过程其实也同时表现了日后台湾社会政治转化过程的另一面，就是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校园决策过程中校长权力的弱化。以杰出的学院领袖领导大学转型的期望已经注定成为幻影了。这是民主学步下“教授治校”被扭曲的不幸结局。我们竟然得面对一个什么事都不能做的局面，这也是在昔日政治威权以及同时大学神圣性的神话解除后，大学快速庸俗化，学院快速平庸化的结局之一。对台大而言，台大校园其实就是台大本身，甚至，台大校园决策过程与执行的问题不也正是今天台湾政府部门的问题吗？今天台大的制度本身似乎不是为做事而设计的，而是适合权力争夺的场域，尤其以校务会议为然。我想，这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台大同仁都有相同的感受。民主政治不应该只有这样的结局。不平等权力关系与权力间之角逐是不会突然消失的，然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制度的原因。

至于有台大的学生发问：怎么办？我的回答是，目前台湾大学有台湾最好的学生，所以仍有希望，这是好学校的第一条件，

也往往是不公平的历史与社会的优势。台大还要争取更好的老师，这是要成为更好的大学的必要条件。成为好的大学了，校园规划在校园营造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改变才会得到真实的持续支持，校园规划才得以让大学教育改革本身得到物质空间的支持，大学才会有好的大学校园。总之，校园规划不是空间化妆术。

面对全球性之变局，大学与校园的应变能力是一个社会能否力争上游的关键，因为大学既是百年树人之地，能否成为生产知识与推动科技的基地，成为创新氛围 (milieu of innovation) 与合能 (synergy) 产生的新知识之源？它与企业组织间关系的分寸如何拿捏、如何充分发挥研究与应用间的巨大潜力、如何试探历史与社会所建构的制度与机构的边界<sup>②</sup>，正在考验大学的自主性与大学的知识领袖们的视野、才度与智能。再进一步，大学能否真正成为批判性与动态的反省性知识之孕育地方？这是批判的现代性的历史建构。台湾大学没有故步自封的条件，当前的台湾大学一如历史的台湾大学，必须再度转型。历史给我们自身的质疑正是：我们能否开创新局朝向世界级大学，调整功能重新定位大学角色与意义，以及，塑造大学校园之风味？这是对我们作为大学一分子的严肃自我挑战。

#### 注释

在实质规划实务上，大学校园规划有其特殊性。它是一种具有特殊历史与特殊功能的庞大教育机构，所谓百年树人之地。由于这些占有空间的活动都是正式而长期、复杂而影响深远，其连续性又使得其校园空间具备极丰富而强烈的特性，被凯文·林奇 (Kevin Lynch) 称为是机构或机关 (institutions)，当作是一种特殊的实质规划类型来看待 (Lynch, 1971: 343)。

台湾大学的整个校区还包括了陆续归并的台北医学专门学校 (今医学院，1936年将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改为医学部后并入)、高等经济学校 (今法学院，战后改制为台湾省立

法商学院，1947年并入)，南投县竹山的溪头实验林管理处、台北县安坑农场、南投县仁爱乡山地实验农场、文山植物园，以及，用士林芝山岩校地与水源路部分用地交换，2000年移交的台大水源校区...等，全部校地约3.5万ha，接近台湾总面积的1%。目前除法、医、公共卫生学院与附设医院外，文、理、社会科学、工、农、管理、电机信息等学院与进修推广部等都在校总区。校总区面积约110ha。若不计入位于外县市的土地，台大的校产散布在全台北市不少的地方，本文无意一一说明。至于温州街、潮州街、甚至至东门一带，因为自殖民时期起就是台大教职员宿舍分布的地方，值得补充说明。就这部分，殖民城市的层级性模式表现得十分清楚，已经是台北市做为殖民城市的一部分了。越靠市中心，日式住宅的规模越大，多为昔日日籍教授的住宅。越靠台大校总区，因为离市中心越远，规模较小，等级也较低，大多为年轻讲师与助教居住。

可佐以1932年以及1930年代的两张校园配置图做了解，两者差别不大，清楚说明了1928年建校时，校园已具今日的雏形。

并未建成，但是规划的构想清楚呈现。若按日本本土的帝国大学校园配置的惯例，应配置讲堂才是。

大门广场基本上是个70m的正方形，椰林大道则为70m宽、600m长的带状林荫道，以约25m的大王椰所夹起的线性槽状轴线则约20m宽，400余m (过去) 到600m长 (目前)。而以目前傅钟为中心的校园中心广场接近为两个正方形的组合，但是实际尺寸则为140m长80m宽。强化包被感的建筑物高约15m。整理自：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委员会工作小组 (1983)，《台湾大学校园规划》，第238页。

日后傅钟的位置正是中心点。林家公馆建于清乾隆年，为林家收取佃租的“公厅”，为今日公馆地名由来。

加上今日傅钟旁的凤凰木，都是1932年由园艺系中村三八夫及大沼三郎教授所规划，椰林大道也就是这时确立的，见：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委员会工作小组 (1983)，《台湾大学校园规划》，第23页；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小组 (2001)，《国立台

- 湾大学校园规划报告书》，第5页。  
 约西亚·康德 (Josiah Conder) 与东京大学的关系可以参考：Frampton, Kenneth and Kunio Kudo (1997), *Japanese Building Practic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Meiji Period*,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h. 19, 特别是第94 - 95页。
- ⑩ 可以与戈温德林·莱特 (Gwendolyn Wright) 对法国殖民地的研究结论对话，参考：Wright, Gwendolyn (1991), *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06 - 307.
- ⑪ 汉宝德在1970年的演讲稿中曾说过台湾大学校园勉强可归入美国杰弗逊传统下 (Jeffersonian)，以维吉尼亚大学为典范的，夸张的巴洛克仪典性象征。它以理性为高贵的目标，代表了知识贵族的观念，阶级观念仍然很强，校舍以庄严与秩序，傲视周遭社会。见：汉宝德 (1971)，“教育精神的象征：学校建筑所传达的信息”，《建筑的精神向度》，台北：境与象，第249 - 250页。
- ⑫ 当时台湾大学的大学角色用傅斯年的话来说是：“以台北帝大为台湾总督府的学术参谋团，作为南进政策的基础。”1949年4月16日，38学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见：李东华 (1996)，“勋绩尽瘁，死而后已——傅孟真先生在台大”，《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附录，第153页。
- ⑬ 既然台北帝大为研究东南亚资源与便利为在日本青年升学而设，当时的台湾人只能读理农学部与后来的医学部，徐庆钟、蔡雨泽、黄春木是1928年唯三位“本岛人”就学者之一。台人子弟受限于报考资格，能参加大学考试的人数很少。台北帝大学生主要来自台北高等学校 (光复后改制为师范学院)、台北商业专门学校 (后并为台大法学院)、台南工业专门学校 (成功大学前身)、台中农林专门学校 (中兴大学前身) 及台北帝大预科 (设于士林)。
- 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军事与经济要求，日本人在1940年由东京帝大工学部机械工学科丹羽重光等人组成工学部创设委员会，筹备成立台北帝大工学部。
- ⑮ 殖民时期末期，台北帝大校本部学生不到百名，到2000年，台湾大学全校则计教师1801人，职员838人，大学部学生16,785人，硕士生6,409人，博士生2,563人。
- ⑯ 傅斯年就任校长后淘汰不胜任教师与新聘教师众多，像方豪、李济、姚从吾、劳干、董作宾、毛子水、董千里、钱思亮、蒋硕杰、全汉升...等等，更详细的名单可见：李东华 (1996)，“勋绩尽瘁，死而后已——傅孟真先生在台大”，《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133页，注10、11。
- ⑰ 台北帝大时学生才数百人，1950年时的台湾大学已经增到3000多人，因此傅斯年当时紧急的校园营造就是学生宿舍与上课的大教室，见韩复智 (1996)，“傅斯年先生年谱”，《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294 - 295页。
- ⑱ 台大“四六事件”一直经过了近50年才得到初步澄清，参考：台大“四六事件”资料收集小组 (1997)，“台大‘四六’事件考察——四六事件资料收集小组总结报告”。
- ⑲ 参见：李秀美 (2000)，“倾听傅钟的回荡声响——傅斯年”，2000年台北人物志，蕃薯藤数字科技，<http://value.yam.com/taipeipeople/edu01.htm>；以及，李东华 (1996)，“勋绩尽瘁，死而后已——傅孟真先生在台大”，《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129 - 161页。
- ⑳ 关于空间的表征与再现的有关概念请参考：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N. Donaldson - Smith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夏铸九 (1997)，“再理论公共空间”，《城市与设计》，第2、3期，12月，第63 - 76页。
- ㉑ 傅斯年是北大“五四辈”的学生，在胡适影响下发起《新潮》与《新青年》呼应，鼓吹新文化，号召启蒙，带头火烧赵家楼 (曹汝霖宅)。他曾任北大代理校长，1949年为陈诚电邀由南京来台成为台大校长。参考：欧阳哲生 (1996)，“傅斯年与北京大学——纪念傅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传记文学》，第96卷，第2期，第16 - 22页；民视新闻网 - 台湾笔记 <http://www.ftvn.com.tw>。至于在治学方法上，或许，正因为傅斯年稟持的
- 现代史学，或者说，实证史学的认识论立场，才使得他安然以学院的殿堂，短时间内勉强与当时的现实政治保持一点距离。傅斯年的史学研究角度可参考：李泉 (1996)，“傅斯年与中国近代实证史学”，《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35 - 55页；王泛森 (1997)，“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新史学》，第8卷，第2期，6月，第93 - 131页；杜正胜 (1998)，“史学的两种观点——沈刚伯与傅斯年”，《当代》，第133期，第48 - 63页。
- ㉒ 参考：王泛森 (1995)，“傅斯年档案杂记”，《当代》，第116期，第33页；赵毅衡 (1999)，“求博？还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BBCChinese.com。
- ㉓ 1972年底选举时康宁祥在校门口演讲，指着台大校园，点明台湾大学与日本殖民时期台北帝大关系，要求学生跳脱为统治者与侵略者服务的角色，关心社会与人民，不要关在象牙塔里。这种视野在1970年代初的台湾颇令人震撼。参考：郑鸿生 (2001)，《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台北：联经，第180 - 181页。也由于如此，在1978年底选举之前与举办过程中，台大校方以管理之名，把广场列为校园内部空间，用围墙围了起来。至于郑鸿生的书，乃是从1970年代质朴的年轻左翼学生角度，对当时台大校园反抗活动的历史告白，对今日的台湾社会，仍有值得反思之处。据郑鸿生相告，他在撰写该书时，当年台大校园及其周遭的整个场景就一直盘踞脑海，还包括了蟾蜍山脚、景美万盛街、新生南路、瑠公圳、温州街、大门对过的罗斯福路“大学口”一带等等。成稿时本希望画一张地图，标明重要相关地点，惜因时间与出版社原因而作罢。这其实就是校园的意象图 (image map)，是1970年代年轻的学生校园生活地图，也是这些学生所认识与想象中的台大校园，值得研究。到了1990年代，校园民主的脚步加快，性别与性欲特质的运动冲撞保守的校园围墙。男、女同性恋社团在台大校园中首先浮现，隐性的情感经验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认同过程，台大校园的空间与权力关系受到检视，公私领域的监控 (surveillance)



被因校园“现身”而受到强大的挑战。可以参考：张乔婷（2000），《驯服与抵抗：十位校园女菁英拉子的情欲压抑》，台北：唐山，第三章，“女同志浮现：台湾大学”。

- ②4 1956年，因阳明山道路拓宽工程剩余松柏一批，阳明山管理局赠与台大，由园艺系负责设计，种在椰林大道上，因阳光充足，生长过大，在台风季节变成总务处事务组校园植栽维护的难题。同时期，园艺系于景让、高化成、杜廉性教授另建议种植杜鹃花于两侧。见：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小组（2001），《国立台湾大学校园规划报告书》，第7页。
- ②5 譬如说，日本社区营造与参与是设计的进步学者延藤安弘目睹在台大校园中市民们轻松享用校园户外空间的场景，认为日本校园的开放性都未及。
- ②6 在虞兆中教授出掌台大校长之前，台湾大学由于其领导性角色的特殊性使然，台大校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校园安定，而不是其它任何有关大学教育发展本身的事。
- ②7 校园的有形边界是过了时的象牙塔产物。对校园与城市之间，校园与社会之间的有形与虚拟的边界的界定、突破与虚拟化，必然会在新的世纪里被重新定义。举例言，作为新竹璞玉计划的顾问，作者曾建议未来的交大校区要与高科技厂商的研发中心整合在同一个地方，不宜斤斤计较校园实质空间的面积。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王泛森 (1995). 傅斯年档案杂记. 当代, 第 116 期: 30 - 53.
- 2 王泛森 (1997).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新史学, 第 8 卷, 第 2 期, 6 月: 93 - 131.
- 3 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委员会工作小组 (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研究室规划) (1983). 台湾大学校园规划. 1996 年影印出版.
- 4 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小组 (召集人: 黄世孟教授) (2001). 国立台湾大学校园规划报告书.
- 5 台大四六事件资料收集小组 (1997). 台大“四六”事件考察——四六事件资料收集小组总结报告.
- 6 民视新闻网 - 台湾笔记, <http://www.ftvn.com.tw>.
- 7 杜正胜 (1998). 史学的两种观点

——沈刚伯与傅斯年. 当代, 第 133 期: 48 - 63.

- 8 李秀美 (2000). 倾听傅钟的回荡声——傅斯年. 2000 年台北人物志, 蕃薯藤数字科技, <http://value.yam.com/taipeipeople/edu01.htm>.
- 9 李东华 (1996). 勋绩尽瘁, 死而后已——傅孟真先生在台大. 台大历史学报, 第 20 期: 129 - 161.
- 10 李干朗 (1980). 台湾近代建筑: 起源与早期之发展 (1860 - 1945). 台北: 雄师.
- 11 李泉 (1996). 傅斯年与中国近代实证史学. 台大历史学报, 第 20 期: 35 - 55.
- 12 夏铸九 (1997). 反省台大校园规划: 1980 年初推动的《台大校园规划》感想. 台大透视, 校园规划与性别专辑, 冬季号: 1 - 5.
- 13 夏铸九 (1997). 再理论公共空间. 城市与设计, 第 2、3 期, 12 月: 63 - 76.
- 14 夏铸九 (2000). 殖民的现代性营造——重写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建筑与城市的历史. 台湾社会研究, 第 40 期: 47 - 82.
- 15 张乔婷 (2000). 驯服与抵抗: 十位校园女菁英拉子的情欲压抑. 台北: 唐山.
- 16 赵毅衡 (1999). 求博? 还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 BCCChinese.com.
- 17 郑鸿生 (2001). 青春之歌——追忆 1970 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 台北: 联经.
- 18 韩复智 (1996). 傅斯年先生年谱.

台大历史学报, 第 20 期: 231 - 306.

- 19 汉宝德 (1971). 建筑的精神向度. 台北: 境与象.
- 20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75). The Oregon Experi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1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2 Leu, Chir-wen (1985). "Ten Years' Experience with the Oregon Experiment: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a Campus Planning Process", master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 23 Lynch, Kevin (1971). Site Planning.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24 Frampton, Kenneth and Kunio Kudo (1997). Japanese Building Practic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Meiji Period.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25 Wright, Gwendolyn (1991). 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简介】

夏铸九, 男, 博士, 台湾大学城乡规划研究所教授。

【收稿日期】2002 - 04 - 08

夏铸九 校园重访：反省台湾大学 1980 年代的校园规划

## 故宫开始大规模维修

故宫博物院近日开始建院以来规模最大的维修工作。据有关部门透露，这次维修将历时 7 年，最终将使故宫博物院由目前以展示宫廷史迹、藏品为重点，改造为集中展示清朝宫廷原状；对外开放的面积由现在的 40 万 m<sup>2</sup> 扩大至 50 万 m<sup>2</sup>，以向广大观众提供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

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维修工作，将根据对于故宫博物院价值的重新论证和定位，对 6 个方面进行维修。一是将大面积的地面与道路恢复原状，将混凝土砖、沥青柏油地面、路面更换成原来的粘土砖地面；二是对结构发生损坏、内外装修残破的武英殿、寿康宫、慈宁宫及慈宁花园等重点古建区域，进行抢救性修缮；三是对于藻井、天花板、花罩、隔扇等古建筑内装修进行保护修缮；四是对大量露天石质和铜质文物进行科学清洗和保护；五是修缮已经老化残破的城墙及部分院落围墙；六是完善已经落后老化的基础设施，如消防报警和技术安全防范系统，地下水系统和供电系统也将进行相应的改造。